

近代史上有突出贡献的戈氏父子

■熊月之

戈鲲化、戈朋云父子，都是近代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。

近代中西交接，人员往来，货物对流，信息交汇，异质文化之间逐渐出现一批双视野人。他们视通中西，从事与不同文化联系、交流、会通相关的活动，或传教（如马礼逊、麦都思），或行医（如魏林、嘉约翰），或从事教育、出版工作（如理雅各、傅兰雅），或多业兼营（如林乐知、李提摩太、李佳白、卫理贤）。他们既有来自欧洲、美国的，如上述诸人，也有出自中国的，如容闳、王韬、沈毓桂、唐廷枢、颜永京、蔡尔康。由于近代中国处于文化人超地位，在中西文化交流中，就人物互动而言，欧美流入的多，中国流出的少，上述所列人物均以中国为活动基地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戈鲲化（1836—1882）作为光绪初年就到哈佛大学传授中国文化的教授，其意义就相当突出。

戈鲲化赴哈佛执教，直接的人事关联，一方面是宁波税务司、美国人杜德维热情推荐，杜曾受教于戈，对戈有良好印象；另一方面是戈鲲化欣然接受。戈在赴美之前，就先后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、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。他思想开明，对西方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持比较平实、开放与欣赏的态度，对于西洋轮船、火车、西洋建筑，还有上海的《申报》，都有好评。他情商很高，心态平和，所到之处，无论是军营还是领馆，都有和睦的人事关系。他虽然已有秀才身份，但并不想在科举道路上苦磨硬拼。这是他能够在外国领事馆工作那么多年，也乐意赴美任教的思想基础。光绪初年的中国，尽管外国公使已经驻京，通商口岸已经成串，传教士已经进入内地，但排外气氛依然相当浓厚，郭嵩焘担任出使英国大臣竟然会被视为汉奸，京师同文馆招收士



戈鲲化是登上哈佛讲台的第一个中国人。

子学习西学竟然遭到士大夫的集体抵制。在此背景下，戈鲲化能携全家赴美任教，实在是具有相当大勇气的。戈鲲化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教授中国文化，时间很短（1879—1882），所教学生也为数寥寥，但其象征意义很大。尽管此前耶鲁大学、加州大学都已开设过汉学课程，但那都是西方学者在西方文化氛围中所开。戈鲲化所教所言所行，其家人的一举一动，他们与美国人的交往，都具有开拓性的文化意义。

戈朋云（1867—1927）青少年时期受过很好的西学教育。他7岁时，曾入读英国圣公会在宁波所办教会学校读书，12岁随父赴美后，进入当地据称是最好的学校读书，并受洗皈依基督教。1882年其父去世以后，戈朋云返回中国，在上海入读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办教会学校中西书院。1883年受林乐知推荐留学哈佛大学，1891—1892年间回国。据称，他回国后，因长期不讲中文，“几不能作中国语，见家人，辄作种种手势

示其意”（听冰生《人物小志》，《申报》1925年11月25日）。在那个时代，像戈朋云这样能有机会系统地接受那么长时间西式教育的人，除了容闳所带的那批留美幼童之外，在中国大地上微乎其微。戈朋云回国之际，正是国家需要此类人才之时，可惜的是，他似乎没有获得一展己长的机遇。回国以后，他一度在天津炮台、南京等地工作，并未发挥其西学特长。1898年末，受丁韪良推荐，任京师大学堂英文副教习，算是用当其才，但因时局动荡，在京工作时间不长。1899年，他在上海创办中英学社，教授英文，算是为社会贡献其英文长项，但时间似乎也不长。

戈朋云回国以后，为何没能找到发挥其特长的的工作？有史料显示，似乎是由于戈朋云比较高，不屑于与一些并不真懂西学而自以为懂西学的人一争高低。庚子以后，戈朋云主要在上海、南京等地生活。他有两大贡献都应载入史册。

其一，他是著名演说家，最突出的活动是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与大闹会审公堂案中，组织公忠演说会，冲在运动前面。后因鼓动罢市，遭清政府通缉，逃亡国外，风声平息后潜回国内。民国以后与书画文学界人士来往较多，但公开演说仍是其重要社会活动。民国初年上海作公开演说的，就演说数量、社会反响而言，无出戈朋云之右者，无论是民众集会，还是学校与机关活动，每每活跃着他的身影和极富特色的演说。戈朋云在演说方面的成就，似与他在美国所受教育有关。他手订的《上海公忠演说会规则》，洋洋32条，可谓近代中国第一部关于公开演说的规则。细读这些规则，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中洋溢的爱国、民主、自由、平等的文化气息。关于戈朋云在演说方面的贡献，多次聆听过戈氏演说的郑逸梅先生曾有生动的记述，称戈为“上海最早的演讲家”，演说极有技巧，很能打动人心：

（戈朋云）初登台时，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话，随口出声，嗓子并不高，或许座位较后者没有听出来，就是听清楚的也以为平平庸庸，毫无奇警之句。可是细细辨味，他所说的却似文章的总冒，作开发下文的张本。于是一句紧一句，声音也一句响一句，说到紧要关头，声色俱厉，使听客的四肢百骸，完全兴奋起来，好像演讲者一颗热烈的心，要从他腔子里跳跃而出。起初漠然的，至此没有个不瞿然注视他，似乎他是发电机，听客都通了电流一般。后来关炯之和会审西官大闹公堂，他又仗义在徐园演讲，

有力的援助，巡捕房派了许多武装巡捕包围他，他不屈不挠，侃侃而谈，巡捕奈何他不得，结果被他说得全上海的商铺都闭门罢市，居然关炯之在公堂上争得了主权，大大的有面子。从此凡开什么禁烟会咧，女子天足会咧，光复时的剪辫会咧，他总是声泪俱下的演讲，收着很大的效果。（郑逸梅：《上海最早之演讲家戈朋云》）

美国文化氛围比较开放，培养出来的学生，多善于表达，每善于演说。戈朋云在演说方面的成就，当与其在美国所受教育有关。

其二，倡导家庭教育。早在1905年，在创办公忠演说会时，戈朋云便提出家庭教育问题，强调父母对于其子成人后，宜令其自立、自由，而于其未成人时必严为教诲、约束，以造成其异日自立、自由之基础；让他们从小懂得平等、自由之真谛，懂得压制与管束、奴隶与侍从的区别。1909年，他在南京发起成立家庭教育研究会。1914年，他撰写《家庭教育必要》一书。书凡十六章，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家庭教育问题的见解，认为教育由三个部分组成，即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，其中家庭教育应该列为第一位。书中所论家长应当为子女树立榜样与自戒之处，儿童应当具备之美德，处处体现自立、自主、民主等文化特点。

戈朋云的两大学贡献，都与他的留学美国有关。中国自古当然也有演说、家庭教育，也有重视演说、家庭教育的论述，但是，将演说、家庭教育问题论述得如此透彻，并努力践行的，戈朋云当为代表。

戈鲲化、戈朋云父子在近代史上都有一定地位，都很值得研究，对于推动近代中国留学史、中外关系史、思想文化史（包括教育史）研究，都有一定意义。

我对孙犁先生晚年的那次婚姻及当事人张保真女士颇为关注，还在《美文》杂志上写过一篇《据说我见到的是孙犁夫人》的文章。近日偶然在图书馆里发现了一本苑英科先生所著的《岷然独立：孙犁纷争》（河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），翻阅后，对孙、张为时五年左右的一段婚姻之缘起、矛盾、睽离，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。关于孙、张这场失败的婚姻，张保真未曾置过一词，甚至连她后来的下落也成了个谜。只知道与孙犁分手后，她曾在安徽省文联任专业作家，是著名散文家。

张保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2年那届的毕业生，和乐黛云是同学，后进入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所学习，翌年4月到《人民文学》任编辑，处理翻译作品和儿童文学稿

人间唯有情难诉

■李成

件。这一资讯来自于白榕先生的回忆文章《京城往事（五）》（载《江淮文史》2004年第六期）。白榕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，与张保真同时到《人民文学》工作，下放青海后调到安徽省文联任专业作家，是著名散文家。

苑英科通过艰辛考索在书中揭示了有关张的“蛛丝马迹”，《朔方》1983年11期，发表了署名张保真的一首诗，名为《普陀山的问讯》，并全文转引，说：“如果这位张保真就是孙犁的续弦者，那么这首诗就有了弦外之音。”他分析道：“这首诗，与其说是作者对一位遁入空门的少女的问讯，不如说是对作者自己的问讯……”

张保真似乎总是喜欢用比喻或寄托的方式为文，她发表于《安徽文学》1987年第十二期散文专号第一篇的《人间惟有情难诉》，写的就是对植物——树的情愫。

这篇大约3000来字的文章还是有一定信息量的：

我爱树，不仅仅从它的实用价值，如保持大自然的生态平衡，以及烧水煮饭桌子板凳等等的需要出发。在众多令人目眩神秘的色彩中，绿色最能使我眼目清凉；白杨那永不休止的萧萧告诉我，我所寄身的世界清凉可喜，适宜生存。也许是一种畸变，我往往泯灭了物我的界限，把树看成慷慨富足的朋友，无虞地向它索取心灵的慰安。每当我因得了不足道的什么而欢喜时，它能使我心情淡泊一些；每当我因失去了不足惜的什么而悲伤时，它能使我心情开阔一些；它委实帮助着我，在崎岖多变的世路上尽量不失去心理的平衡，至少为时不要太长，倾斜不致过巨。每当绝望的浪潮袭来，我宁愿暂时离开人群去与一棵随便找到的树相对，心也因此比较容易地由沸腾转入了平静。在需要的时候，我的灵魂便和归巢的鸟儿一起在树枝上栖息，我深深地感到了它们的恩情。因为，

抚慰也罢，劝解也罢，启示也罢，本不一定非借助语言的形式出现不可，它们那挺拔的躯干、清华的风姿，它们那深固于大地的执着与永远向上的顽强，本身就告诉了我，一切的生物都应该这样站立在天之下、地之上，还有弥足珍贵的，它们那亘古迄今的沉默，使我多么愿意收起喋喋不休的舌头，换上一个深沉的品格。我怎么能够否认呢，无论在精神世界还是物质世界，树都是一种稳定的力量。

之所以摘录这么一大段，一方面是可以见识作者的文采，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心境。虽说是托物言志或借物抒情，今天看来也可说是非常直白了，而其中有些词汇或者说表述尤其耐人寻味。如“也许是一种畸变”，“每当我因失去了不足惜的什么而悲伤时”，毫无疑问，这其中所指也当包括孙、张婚变。而“在崎岖多变的世路上”，“绝望的浪潮袭来”云云，更可见出作者所经历的事沧桑与遭遇的打击之大。而树的风华、镇静，对于她而言，不仅是抚慰更是一种深刻的兆示与启迪，所以她才寄情于树，深情地咏出对树的赞歌。张保真后来果真消失于于海，仿佛遁身世外，或许正是从树身上获得启示的结果。